

法国藏孙中山革命活动相关档案述略^{*}

侯庆斌

摘要:较之孙中山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苏俄的关系,学界对孙中山与法国的关系着墨不多,法文史料的搜集、译介和利用相对不足。法国外交档案中包含大量孙中山革命活动相关史料,具有重要价值,亟待研究者发掘和利用。首先,法语文献有助于拓展孙中山研究的史料基础,弥补中文史料的不足和偏失。其次,法国外交档案有助于拓展孙中山研究的议题,考察法国因素在孙中山革命历程中的角色,亦可为中法关系史研究开辟新领域。最后,孙中山的革命形象具有与时俱进的宣传价值,以编研史料的方式重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迹,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革命活动;法国;法国外交档案

DOI: 10. 11714/jssu. sse. 202605002

孙中山研究兼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史学界的一门显学。孙中山的革命行迹遍及中外,其与列强的羁绊甚深。围绕孙中山与列强的关系,中外学界著述颇丰,但远未到题无剩意的程度。其中孙中山与法国的互动尚未受到重视^①,法文档案的搜集、译介和利用相对滞后^②。1900年孙中山通过法国驻日公使阿尔芒(François Jules Harmand)向印度支那当局谋取军事援助,被视为孙中山对法联络的开端。法国政府由此开始正视孙中山及其革命力量,此后双方互动频繁。一方面,孙中山在两广地区先后领导反清运动和建立军政府,法属印度支那因地缘关系成为孙中山对外联络的重心之一。另一方面,孙中山重视维持与上海法租界的特殊关系。后者不仅为政治失意时的孙中山提供庇护,而且成为孙中山筹划革命的重要基地。以上活动留下大量档案资料,有待研究者发掘和利用。本文旨在介绍与孙中山革命活动有关的法国外交档案的源流、分布和内容,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探讨相关法藏档案的价值,以期拓展孙中山研究的史料基础和研究思路。

^{*} 收稿日期:2026—04—19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法国驻沪领事馆藏孙中山档案整理与研究(1900—1925)”
(2025BLS006)

作者简介:侯庆斌,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暨历史学系(上海200241)。

① 学界概况参见陈三井:《孙中山与列强关系——六十年来台湾学界研究之回顾》,氏著《四分溪畔论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389—390页;陈三井:《中山先生与法国》,台北:台湾书店,2002年;陈三井:《法文资料中所见的孙中山先生》,黄季陆等:《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5年,第275—290页。

② 陈三井、葛夫平和蒋杰对法藏晚清时期和抗战时期中法关系档案做过介绍,没有专门论及孙中山相关档案。参见陈三井:《中法关系研究之回顾》,氏著《四分溪畔论史》,第329—332页;葛夫平:《法国所藏有关清史档案介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主编:《清史译丛》第5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2—282页;蒋杰:《法国藏中国抗战档案史料述略》,《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

一、孙中山相关法文史料的整理和利用

已刊孙中山革命活动相关外文史料(或其译文)主要见于三类文献^①。第一类是以孙中山为主题资料汇编。例如中山大学历史系等机构合编的《孙中山全集》、林家有等编的《孙中山全集续编》、俞辛焯等编译的《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8—1916·4)》、桑兵主编的《孙中山史事编年》和《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的《馆藏辛亥革命前后中外文档案》以及黄彦主编的《孙文全集》等^②,其中收录外国友人和政要的来信、英国蓝皮书、日本外务省档案、海关档案、外媒报道和采访等史料。第二类是以革命为主题的公私藏档,涉及孙中山与列强、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例如《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等^③。第三类是租界档案。嘉曼(Robert L. Jarman)主编的《上海政治与经济报告(1842—1943)》,收录英国驻沪领事馆和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对孙中山言行的观察。上海市档案馆主编的《辛亥革命与上海》一书附录,披露1922年至1923年孙中山在上海期间法租界警务处的监视记录。徐涛、朱玖琳等学者也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警务处档案中摘译了与孙中山有关的史料^④。

以上史料整理存在两点不足。其一,法国公藏机构档案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已刊外文史料多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和俄国。早在1975年,台湾地区学者就提到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有大量与孙中山有关的资料^⑤,但至今未见系统整理。其二,较之其他语种史料,已刊法语史料(或译文)数量较少,个别史料的价值相对有限。例如,章开沅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选编1903年至1913年法国外交部有关中国问题的函电213件,其中仅20件与孙中山直接相关。黄彦主编的《孙文全集》第3册、第4册和第11册,收录孙中山与法国政商界人士和新闻记者的谈话译文若干篇、孙中山的法文版著作1部和孙中山致法国驻日公使阿尔芒的意见书。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的《馆藏辛亥革命前后中外文档案》收录海外华人和法国友人写给孙中山的法语信,内容仅为祝贺辛亥革命胜利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上海法租界警务处档案对了解孙中山在沪活动有一定价值,但下层情报搜集者的观察不等同于法国上层外交官的最终研判。整体而言,受限于研究旨趣、语言障碍、档案数位化程度低等因素,与孙中山相关法文史料的整理多年来进展缓慢。

① 本文中的“孙中山革命活动”指孙中山直接领导或参与的针对清政府和北洋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的革命活动,不包含各省革命派人士在地方的独立行动和国民党驻外国支部的活动。

②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1986年;林家有等编:《孙中山全集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俞辛焯等编译:《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馆藏辛亥革命前后中外文档案》第5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黄彦主编:《孙文全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

③ 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编:《宫崎滔天家藏:来自日本的中国革命文献》,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④ Robert L. Jarman ed., *Shanghai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 1842-1943*, 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 2008;上海市档案馆编:《辛亥革命与上海》,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徐涛:《新获孙中山稀见文献的译介与考释(1916—1917年)》,廖大伟主编:《近代中国》第42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第3—36页;朱玖琳等译注:《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关于纪念孙中山活动情况的报告》,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5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234—263页。

⑤ 陈三井:《法文资料中所见的孙中山先生》,黄季陆等:《研究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第287页。

较之档案的整理和刊布,孙中山专题研究对法文史料的利用程度也不乐观。第一类研究聚焦于法国政府对孙中山的态度,侧重晚清时期。巴洛(Jeffrey G. Barlow)、芒霍兰(J. Kim Munholland)、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许文堂和庄和灏等人的著述,展现了孙中山争取法国政府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援助两广地区反清活动的过程^①。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张振鹄、吴乾兑等人考察了法国对辛亥革命的反应^②。以上成果利用法国外交档案,梳理法国“欧陆派”和“殖民派”对孙中山态度的演变,揭示了孙中山失去法国政府支持的原因。此外,陈三井的专著《中山先生与法国》依时间顺序梳理了孙中山与法国的关系。该书虽然内容全面,但在法文史料的利用方面没有突破。第二类是西方学者撰写的学术性评传。其中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和白吉尔的《孙逸仙》值得重视。前者以孙中山的对外联络作为叙事线索,尤其注重苏俄的积极影响^③;后者关注孙中山融入时代的方式及其形象的塑造,以孙中山所处的复杂历史环境解释其一生的多变^④。以上两部著作论及孙中山与法国的关系时主要借鉴了中文史料和既有成果,未能展现法文档案的丰富性。第三类研究围绕孙中山与上海法租界的关系展开。王耿雄的专著《孙中山与上海》和熊月之的论文《孙中山与上海》都强调上海法租界是孙中山谋划革命的重要基地;徐涛的论文《孙中山与上海关系新论》考订孙中山抵沪次数和居留时长,深化了前人的观点^⑤。此类研究以孙中山的经历和感受立论,将他与法租界的特殊关系归因为法方的宽容和法租界的宜居环境,缺少法方视角和相关史料。

上述成果对“孙中山与法国”这一主题具有拓荒之功,但受限于史料和视野,仍有诸多未尽之意。其一,关于孙中山与法国政府的互动,尚有大量空白亟待填补。一方面,既有研究聚焦于清末和辛亥革命时期,缺乏其他时期的个案,难以从长时段呈现法国因素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前人对法国外交体制关注不多,未能探究法方决策的过程,无法呈现与孙中山有关的情报搜集、信息流转和趋势研判诸环节对法国在华政策的影响。其二,关于孙中山与法租界的关系,尚须引入新史料和新视角。据学者统计,孙中山一生中18次来到上海,其中1911年至1925年间达11次,累计居留时长5年19天,超过他在广州的时间^⑥。孙中山抵沪后主要居住于法租界寓所,既有研究缺少从法方视角探讨孙中山与法租界特殊关系的成因及其限度。一方面,法租界当局对孙中山的态度取决于时局和在华利益,不宜用“宽容”二字解释。另一方面,前人对法语文献的征引不足,难以凸显上海多元城市属性在孙中山革命生

① Jeffrey G. Barlow, *France and Sun Yat-sen, 1900-1908*,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9; J. Kim Munholland, "The French Connection that Failed: France and Sun Yat-sen, 1900-1908",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2, No. 1 (Nov. 1972), pp. 77-95; [法]白吉尔:《二十世纪初法国对孙中山的政策——布加卑事件(1905—1906)》,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42—451页;许文堂:《孙中山在法国的革命活动和党务组织》,张希哲、陈三井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571—585页;庄和灏:《1900—1909年间法国政府内部应对孙中山革命的因应研究》,《法国研究》2024年第4期。

② Marianne BASTID-BRUGUIERE,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et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de 1911",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 Contemporaine*, Tome 16, N°2, Avril-juin 1969, pp. 221-245; [法]巴斯蒂:《法国的影响及各国共和主义者团结一致:论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关系》,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454—470页;张振鹄:《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吴乾兑:《1911年至1913年间的法国外交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③ [美]韦慕庭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④ Marie-Claire Bergère, *Sun Yat-sen*, Paris: Fayard, 1994.

⑤ 王耿雄:《孙中山与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熊月之:《孙中山与上海》,《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3期;徐涛:《孙中山与上海关系新论》,《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⑥ 徐涛:《孙中山与上海关系新论》,《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涯中的角色,不利于探讨孙中山频繁在法租界而非公共租界活动的深层原因。

二、法藏孙中山革命活动相关档案的源流和分布

法国外交档案中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记录源自法国在远东地区的情报活动。法国驻外人员中,武官实际上负责情报工作,外交官名义上不得从事间谍活动。不过,武官虽来自陆军部或海军与殖民地部,但同时隶属于公使馆或领事馆,因此需要向外交机构负责人汇报工作。除此之外,各地法租界警务处也具有情报职能。整体而言,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北京公使馆和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是孙中山相关情报搜集、传递、研判和政策执行的关键节点。

法国驻华领事机构的核心职责是保护侨民,起初没有常态化的情报搜集制度。1880年代中法越南之争爆发,领事馆的情报职能日益凸显。中法战争结束后,法国政府强化了电报加密技术。与此同时,法国驻华领事机构的情报职能趋于完善^①。

一方面,法国驻华各地领事馆需定期向北京公使馆和法国外交部汇总辖区内政治、军事和商务情报^②。法国驻沪领事馆因地处中西交冲的要津,又因上海法租界系法国远东核心利益之所在,其成为法国外交部在华情报网络的重要节点。上海领事馆名义上负责处理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与法国利益相关的事务,实际上承担搜集中国南方军政情报的职责。孙中山及其亲信长期在上海法租界居留和活动,为获得法方支持和庇护,孙中山一方多次联络法国外交官,留下往来函电和会谈纪要。法方则以“保护”之名监视孙中山的活动,亦留下大量记录和报告。即便孙中山没有身处上海,法国驻沪领事馆也会关注他本人及其追随者在南方的言行,将信息上报北京公使馆和法国外交部,由此形成一批档案。

另一方面,中法战争结束后,法国驻中国南方边境省份(如广州、龙州、蒙自、南宁、昆明等地)领事馆与印度支那当局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除北京公使馆和法国外交部之外,这些领事馆还需向印度支那总督府汇报中国地方政情,并在紧急状态下听命于印度支那总督^③。因此,印度支那总督府构成法国在华情报网络的枢纽之一。清末民初,革命人士不断尝试从法国政府和印度支那当局获得武器、庇护和外交承认,而法国既想趁机攫取中国西南地区的路矿控制权和贸易特权,又担心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将反帝思想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引入印度支那。中国西南地区的法国领事馆与印度支那当局相互配合,密切关注孙中山及其支持者的活动,由此形成关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另一批法文档案。

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日常事务起初没有各地领事馆那般繁杂。1860年代,公使馆只有公使、秘书、翻译、随员和主事共5人,公使的职能仅限于缔结条约和履行法国常驻代表职责。1870年代起公使馆增加一位武官和一位医生。1880年代法国公使不再由贵族专任,而从法学本科毕业生、律师和外交官中培养和选拔。随着任职标准侧重法学教育背景和外交实务经验,公使的职权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涉足情报工作。公使馆工作人员相应增加,1900年代增至十余人,到1920年代人数仍在增长。简言之,北京公使馆在法国外交部和驻华领事馆之间扮演上通下达的角色,成为法国对华政治、军事和经济情报集散的另一个枢纽^④。北京公使馆和印度支那当局对中国各地情报的汇总,构成法国制定对华政策和应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重要参考。

以上机构的档案分别保存在位于巴黎的外交部档案馆(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①②③ Nicole Bensacq-Tixier, *Histoire des Diplomates et Consuls Français en Chine (1840-1912)*,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8, pp. 153-159, p. 409, pp. 410-418.

④ Nicole Bensacq-Tixier, *Histoire des Diplomates et Consuls Français en Chine (1840-1912)*, p. 161; Nicole Bensacq-Tixier, *Dictionnaire du Corps Diplomatiques et Consulaire Français en Chine (1840-1911)*, Paris: Les Indes savantes, 2003, pp. 581-582.

Etrangères)、位于南特的外交档案中心(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和位于埃克斯—普罗旺斯的国立海外省档案馆(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Mer)。以下对相关档案的内容和利用情况做一概述。

(一)外交部档案馆

该馆馆藏法国外交部巴黎本部涉华档案和北京公使馆档案。与孙中山有关的资料分布于“政治与商业通信”(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commerciale)系列“新辑·中国(1897—1918)”(Nouvelle Série, Sous-série Chine, 1897—1918。以下简称“NS档”)和“E辑·亚洲·中国(1918—1940)”(Série E-Asie, Sous-série Chine, 1918—1940。以下简称“EA档”)。这两组档案内设“内政”“对外政策”“各省新闻”“外国租界”“商务”“司法”等专题,内容包括中法两国政府间的交涉、驻华领事馆与北京公使馆的往来函电、法国外交部与北京公使馆的往来函电等等。前人研究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与法国的关系时使用了NS档。例如巴斯蒂使用“国家财政”档案(NS357)和“私营经济”档案(NS355、NS405等)梳理了法国在华投资情况,又利用“内政”档案(NS26至32、NS128等)中领事馆、公使馆和印度支那总督府致外交部的报告,考察法国对辛亥革命的反应。张振鹄使用“对外政策”档案(NS204)研究1911年11月孙中山在法国的求援活动,另援引“教育”档案(NS582、NS583)中昆明领事馆的报告,考订孙中山在巴黎期间的重要助手张翼枢的生平。既有研究受限于研究时段和研究对象,对NS档的利用程度仍显不足,对EA档的大规模使用尚未展开。这部分孙中山相关史料虽然零散地分布于各类报告和通信之中,但其价值不容忽视,有助于从长时段考察法国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观察以及法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二)南特外交档案中心

该馆以保存法国驻外使领馆档案为特色,包括了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档案全宗(635PO)。法国领事兼管租界,因此上海法租界档案也收录其中。与孙中山革命活动有关的史料,见于“与外交部的通信”“与公使馆的通信”“中国地方事务”“与地方当局的关系”“印度支那与中国南方”“上海法租界”“法国在华政治和经济情况”“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局势”等条目。内容包括:孙中山及其亲信与领事馆的通信和会谈纪要;法方对孙中山在上海期间的监视和因应;法方对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中华革命党(1914—1919)和国民党(1919—1925)在上海等地活动的观察;领事馆与清政府、袁世凯政府和地方军阀就限制孙中山的活动、缉捕和引渡革命党人展开的交涉等等。学界除翻译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警务处若干份报告外^①,尚未对这批档案展开系统研究。南特外交档案中心还保存了法国驻香港、澳门、厦门、福州、广州等地领事馆档案。这些档案不完整,多涉及当地事务,与孙中山相关的史料极少。

(三)国立海外省档案馆

该馆藏有印度支那地方当局档案以及法国驻中国南方边境省份领事馆档案。印度支那总督府档案中的“政治事务”档(GGI Série F: Affaires Politiques)尤为重要,其中若干子档颇具价值。例如“远东地区法国领事馆”子档,包括龙州、南宁、广州、昆明等地领事馆档案,内容涉及“孙中山的情报(1901—1907)”“孙中山在广州的活动(1924)”“孙中山的逝世(1925)”等。又如“治安与移民”子档,其中“对亚洲外国人的监视”档案设有“孙中山(1900—1913)”专题。再如“政治情报”子档,汇总了法国对孙中山在中国西南地区革命活动的观察以及对1920年代孙中山与地方实力派政争的研判,包括“中国南方的暴动(孙中山)和秘密社会(1906—1907)”“北南之争:吴佩孚(北)、陈炯明(南)对抗张作霖(北)、孙中山(南)(1922)”“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政治领袖:唐继尧、陆荣廷和孙中山(1923)”等。

以上与孙中山革命活动有关的法文档案体量庞大、缺少系统整理且未被数位化,因此多不为学界所知。就其形态而言,1920年代以前的档案多为手写体,对研究者的法语水平和知识背景提出了较高要

^① 上海市档案馆保存了部分法租界档案,目前学界翻译的上海法租界警务处报告就源于此。

求;就其内容而言,这些档案涉及不同时空背景下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能与其他语种史料形成互补和互证,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孙中山研究的议题。

三、法藏档案的史料价值举隅

法国藏孙中山革命活动相关档案的研究可从两方面展开。其一,以孙中山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法语档案弥补中文史料的不足和孙中山自述类史料的偏失,检视孙中山革命历程中法国因素的影响。其二,以法国政府、法国在华机构或外交官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法方在华搜集、传递和研判孙中山相关情报的过程,进而以孙中山领导的历次革命活动及其主导的历届革命政府为线索,梳理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盱衡与因应。下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事件和档案,举例说明法藏档案的史料价值。

(一)布加卑(Boucabeille)与孙中山的合作

1905年至1906年与法军上尉布加卑的短暂合作是孙中山对法联络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法国因素影响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显例。中文史料对此次合作全过程的记载十分简略,集中于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的一段回忆,摘录如下:

一日予从南洋往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叩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扎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予命廖仲恺往天津设立机关,命黎仲实与某武官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某武官调查川滇,命乔宜斋与某武官往南京、武汉……清廷得报,乃大与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请命法政府何以处分布加卑等。政府飭彼勿问,清廷亦无如之何。未几法国政府变更,而新内阁不赞成是举,遂将布加卑等撤回回国。^①

《孙文学说》成书于1918年底至1919年4月,距离孙中山与布加卑的接触已过十余年,孙中山的忆述对诸多关键信息语焉不详。正因如此,既有研究基于法文档案考察孙中山与布加卑合作的始末,分析法国对华政策的得失^②,缺乏从史料批判的角度解读孙中山自述与法文档案之间的微妙差异。具体而言,法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新辑·中国(1897—1918)”的“内政”全宗内NS8和NS9档案,收录布加卑与公使馆以及法国外交部与陆军部协调对华政策的往来函件^③。中法史料的对读比勘,不仅能够弥补孙中山忆述的错漏之处,还能揭示孙中山回顾革命生涯时的书写策略。

关于二人会面的缘起,考虑到1905年2月和5月孙中山两度在巴黎求援无果,布加卑主动来华提议赞助革命党人必有隐情。原来孙中山在巴黎游说时称,日本一旦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将扩大对清廷和整个中国的影响,不会再支持革命党人推翻清政府。孙中山试图利用列强在华角力,劝说法国取代日本向

①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7—238页。

② 参见J. Kim Munholland, “The French Connection that Failed: France and Sun Yat-Sen, 1900-1908”,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2, No. 1 (Nov. 1972), p. 84; Nicole Bensacq-Tixier, *Histoire des Diplomates et Consuls Français en Chine (1840-1912)*, pp. 487-490; 庄和灏:《1900—1909年间法国政府内部应对孙中山革命的因应研究》,《法国研究》2024年第4期;[法]白吉尔:《二十世纪初法国对孙中山的政策——布加卑事件(1905—1906)》,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442—451页。

③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commerciale, Nouvelle Série, Chine, livre VIII (1905 janv. -1906 mars) et livre IX (1906 avril-déc.), 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章开沅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中收录了NS8和NS9中的部分档案以及法国陆军部的部分档案。为行文方便,本节主要引用该书中文档案的译文。

革命党人提供援助^①。法国外交部不予回应。不过这番说辞引起法国陆军部的兴趣。同年6月陆军部计划在华设立中国情报处(Service des Renseignements, Chine),搜集清政府和列强的军政情报^②。陆军部派布加卑联络孙中山,试图招募革命党人搜集情报。可见布加卑来华的初衷并非“赞助中国革命事业”。

就会面时间和会谈内容而言,孙中山忆述不详。布加卑来华途经河内和香港时联系上孙中山的亲信,约定会面时间和地点。10月11日孙中山在停泊于上海吴淞的“卡雷多尼昂号”(Calédonian)上与布加卑会面。孙中山回忆称,他向布加卑表示各省革命党人准备不足,“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扎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其中矛盾之处在于,若布加卑主持并派人调查中国革命情况,为何这些人又归孙中山“调遣”?据布加卑事后的报告可知,会面期间他向孙中山表明来意,要求革命党人充作法方情报人员。他对孙中山表示,只有革命党人证明自身组织的影响力之后,法国政府才会对孙中山的求援予以重视^③。孙中山遂同意革命党人协助法方搜集情报,其此举意在博取法国的好感,进而谋取法方援助。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忆述中回避了同意革命党人供布加卑驱使一事,反而将法方描述为从属者和协助者,将己方描述为主导者。

至于合作草草收场的原因,孙中山认为是法国政府换届所致,其实法国外交部的干涉才是合作终止的原因。布加卑来华后不顾历任公使的反对,坚持认为法国应当积极响应孙中山的请求。1905年法国公使吕班(Georges Dubail)将孙中山视为政治投机者,提醒法国外交部称“我们与孙逸仙搅在一起毫无好处”;又称中国情报处“已与好些孙逸仙的同党联系”,“中国政府对此事也并非一无所知”^④。法国外交部部长为此要求陆军部约束布加卑的行为,避免外交争端,但收效甚微^⑤。1906年新任公使巴思德(Edmond Bapst)再次提醒法国外交部,中国情报处的军官“已被中国当局视为孙逸仙阴谋的参加者”,并强调他本人已与该处断绝联系,以免日后被清政府问责时处于尴尬境地^⑥。同年10月清政府向巴思德出示通信等证据,抗议法国武官与孙中山串通之事^⑦。至此,法方不得不做出正面回应。在法国外交部的强势干预下,10月17日布加卑被召回巴黎,中国情报处被解散。受此影响,孙中山原定的起义计划被迫搁置。事后孙中山对清政府、法国公使和法国政府三方态度的判断均有误。实际上,法国公使知晓布加卑的活动,事后极力修复与清政府的关系。“清廷亦无如之何”并非意味着清政府对法方听之任之,而是从其他渠道获悉中国情报处被撤销,因此不再向巴思德施压^⑧。此外,虽然法国新内阁认为欧洲事务具有更高优先级,但布加卑被召回巴黎与法国政府换届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巧合。

简言之,法国外交档案弥补和修正了中文史料的错漏,揭示法国因素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影响。孙中山被迫中断与布加卑的合作是法国外交官掣肘所致,反映了法国外交部和陆军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法国外交官既担心中国南方的革命活动刺激印度支那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情绪,又担心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将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因此对孙中山态度冷淡。除此之外,以法文档案为参照物,孙中山忆述中的书写策略隐然可见。孙中山一方面试图凸显他本人领导的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的号召力,另一方面在争取外援的过程中不断强调自身的主体地位。

① 《与孙逸仙的谈话》(1905年5月18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第7页。

② 法国公使事后总结了布加卑的活动和中国情报处建立始末,参见《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年12月7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第335—337页。

③ 相关分析,参见Nicole Bensacq-Tixier, *Histoire des Diplomates et Consuls Français en Chine (1840-1912)*, p. 488。

④ 《吕班致外交部长先生》(1905年11月1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第9页。

⑤ 《参议院主席兼外交部长致陆军部长》(1906年2月17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第271页。

⑥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10月15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第46页。

⑦ 《巴思德致外交部长先生》(1906年10月18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第47页。

⑧ 《布里索·德马耶致陆军部长先生》(1906年11月13日),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册,第335页。

(二)1922年法租界当局对孙中山避居上海的反应

1922年8月至1923年2月孙中山因陈炯明部叛乱被迫离开广州避居上海。其间孙中山得益于法租界当局的保护,成功度过危机。这种“保护”是否源于法租界当局对革命者的宽容和同情,值得商榷^①。法国驻沪领事馆档案全宗内“与公使馆的通信”(Correspondance au départ avec la légation),收录1922年上海领事馆与公使馆的往来函件,展示了法方对孙中山离粤北上的情报搜集和研判,有助于揭示上海法租界与孙中山特殊关系的成因及其限度。

1922年6月16日至8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蒙难期间,法国驻沪领事馆评估了他的处境。7月19日总领事韦礼德(August Wilden)致电公使馆称:

根据香港和广州的中国电报公司——因受国民党资助而极不可靠——传来的消息,孙中山还没有处于绝境。然而根据中国商人提供的情报,孙中山似乎没有机会翻盘。我担心,他如果成功逃离广州,将会来到上海法租界。这里有他的寓所,他的夫人正住在里面。

江苏督军询问,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我打算怎么办。据他所言,孙博士的到来将会在长江下游制造骚乱,他希望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在我看来,这显然不可能。如果孙中山被允许居住在法租界,为保护他的安全,我需要采取一些惯用的警务措施。实话实说,我希望事情不要发展到如此境地。不过,我认为即便北京政府正式提出要求,我也不能禁止孙中山在法租界居留。我如果主动这样做,将会受到舆论谴责。^②

这段电文透露几个关键信息。第一,法方对孙中山去向的研判基于中国人提供的情报和宋庆龄的行动轨迹,后者于6月25日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法租界。第二,法国领事对孙中山持疑忌态度,既怀疑他在上海策划新的革命,又忌惮他在舆论中的良好形象,担心驱逐他会激起华人的反帝情绪。第三,法国领事准备同意孙中山入境。这个预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而非对革命党人的同情或宽容。

8月9日孙中山离开广州,次日在香港乘“俄国女皇号”北上。8月11日上午,孙中山的代表张继面见法国驻沪副领事德赉沛(Dufaure de la Prade),试探法方对孙中山的态度。当日德赉沛致电法国公使称:

您刚刚通过电报告知孙中山从香港乘“俄国女皇号”的目的地可能是上海。前参议院议长张继今早就向我确认了此事。他来见我,想了解我对孙中山在法租界居留一段时间的态度。如您所知,孙中山在莫里爱路有一处房产。我向张继保证,只要孙中山的住所依旧是普通民宅而非政治风潮策源地的话,那么他在法租界将得到一如既往的欢迎。我强调,我的警告源于孙中山最近的政策。张继称,孙中山有时对他或对其他人说一些更过激的话,但是孙中山和他的党员都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江苏省交涉署特派员对孙中山的到来同样感到焦虑。我将张继的话转告他,他表示满意。

法国巡捕将秘密监视孙中山的住宅,既保护他的安全,也为公使馆搜集情报。^③

德赉沛提到“孙中山最近的政策”,指孙中山一派在广州宣扬武力统一计划。此外,法方已获悉孙中山接触过共产国际代表,因此,德赉沛质疑孙中山已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经张继的辩解,孙中山一

① 笔者曾撰文探讨过广州蒙难之后孙中山避居上海法租界的经过和法租界当局的反应,参见侯庆斌:《疑忌之间:孙中山避居上海期间租界当局的因应(1922—1923)》,廖大伟主编:《近代中国》第35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第41—62页。

② M. A. Wilden, Consulat Général de France à Changhai à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De Fleuriau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Chine à Pékin, 19 juillet 1922, Centre des Archives Diplomatiques de Nantes(即南特外交档案中心,以下简称CADN), 635PO-C-101.

③ M. Dufaure de la Prade, Consul Adjoint du Consulat de France à Changhai à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De Fleuriau Ministre Plénipotentia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Chine, 11 août 1922, CADN, 635PO-C-101.

方与法租界当局达成默契,即只要孙中山在法租界居留期间不从事过激活动,那么他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

法国外交档案所示,上海法租界当局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并非基于法方的宽容或对革命者的支持,而是法方权衡得失的结果。事实上法方对孙中山的嫌忌从未改变,而孙中山最大限度利用了双方的默契。8月14日孙中山入住法租界寓所,此后一度对外表示支持南北和平统一,否认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联系。1923年1月陈炯明部败相已现,孙中山准备回广州重建革命政府。至此,孙中山不再受制于法租界当局的态度,遂于1月底和苏俄特使越飞在上海会面。由此可见,孙中山与上海法租界特殊关系的成因及其限度,不仅体现了法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也为理解孙中山的思想变化提供了新视角。

结 论

综上所述,法国藏孙中山革命活动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亟待研究者发掘和利用。首先,法语文献有助于拓展孙中山研究的史料基础,还可通过多语种文献互证,弥补中文史料的不足和偏失。其次,法国外交档案有助于拓展孙中山研究的议题,考察法国因素在孙中山革命历程中扮演的角色。同时,孙中山革命活动相关法语档案的形成和流转,有助于探究法国在华情报搜集活动与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为中法关系史研究开辟新的领域。最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常研常新,不只依赖新史料的出现,也源于孙中山一生所凝聚成的革命符号具有与时俱进的宣传价值。以编研史料的方式重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迹,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French Archives Related to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Hou Qingbin

Abstract: Compared with hi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Soviet Union, Sun Yat-sen's ties with France have received relatively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leaving noticeable gaps in the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French historical materials. French diplomatic archives contain a wealth of primary sources related to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fering immense value that urgently awaits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ion. First, French sources expand the empirical foundation of Sun Yat-sen studies, compensating for the limitations and biases in Chinese-language documents. Second, French diplomatic archives contribute to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scope of Sun Yat-sen studies by examining the role of the French dimension in his revolutionary trajectory, thereby opening new horizons for the history of China-French relations. Finally,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image retains a dynamic relevance that evolves with the times. Revisiting his revolutionary journey through the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carries significant contemporary relevance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Sun Yat-sen;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France; French diplomatic archives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周吉梅】